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

袁银传 白云华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和形成的,它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借鉴吸收古今中外人类政治文明建设成果,是实践证明了的科学而合理的制度体系,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彰显其显著优势。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顺利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历史演进 基本经验 显著优势

[中图分类号] D462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袁银传,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白云华,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迈向新征程、取得新成就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国家开展一切治理工作和活动的基本依据和制度遵循,集中反映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本质特点和独特优势,为人类制度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國经验。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大背景、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顺利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演进

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研究”(19ZDA004)阶段性成果。

大会议上的讲话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P333)之所以说制度更带有根本性，是因为制度好坏比个人好坏的社会影响更加具有根本性、导向性。之所以说制度更带有全局性，是因为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规则，它一旦形成，就可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地起作用。之所以说制度更带有稳定性，是因为政治制度是一种“刚性”法则，它一旦确立，就不会由于领导人的流动而改变，也不会由于领导人个人喜好变化而改变。之所以说制度更带有长期性，是因为政治制度经过长期运行和定型便具有相对稳定性，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意志和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可以在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

习近平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2〕}(P60)一个国家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华各民族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创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高效率，经得起历史实践检验并且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根植于中国的社会土壤，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和坚实的实践基础。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就先后在井冈山、瑞金、古田、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支部建在连上”党组织制度、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三三制”等，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索，积累了制度建设的初步经验。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就成立了连、营、团各级士兵委员会，让普通战士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就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3〕}(P65)具体来说，就是公开军队经济，摒弃繁琐礼节，军事长官与普通士兵待遇平等且不体罚士兵，士兵在会议上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军队内实行基层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和感召力。

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抗日与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中广泛实行“三三制”，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中，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人士各占1/3。1945年7月，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与毛泽东讨论政权更迭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毛泽东就十分坚定自信地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4〕}(P156-157)在这里，毛泽东已经明确了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并且对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制度充满了期待和自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构想，继承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优良传统，借鉴法国巴黎公社和苏联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结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建

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探索并确立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根本和基本的政治制度；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实现了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创造性地确立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新经验和新成就，深刻汲取“文化大革命”以及苏共亡党、东欧剧变的历史教训，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及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实践经验理论化、制度化，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1980年8月，邓小平就强调：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P333)}1992年年初，在南方视察中，邓小平又一次语重心长地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5](P372)}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目标，即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要初步建设起新的经济体制，实现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发展目标。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6](P47)}随后，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和要求。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了系统总结和科学概括，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内涵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各项具体制度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注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将其置于突出位置，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7](P512)}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在2016—2020年间，即“十三五”期间实现“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各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2](P791)}党的十九大在科学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两个阶段目标：第一个阶段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8](P20)}第二个阶段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8](P20)}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就宪法部分内容作出符合时代特征和要求的修改，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新部署和新安排，强调“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

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9](P1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十九大确立的两个阶段目标的基础上作了更为具体的安排,即保持2035年阶段目标不变,增添到建党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10](P5)}的阶段目标,同时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的阶段性目标完善为“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10](P5-6)}并对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作了具体的、系统的规定,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了目标定位、提供了方向指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主要目标、战略任务、重大举措,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过程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矢志不渝奋斗、历尽千难万险所取得的最为根本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范化成果、稳固化载体、制度化保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成熟、趋于稳定的重要标志。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开启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征程,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和发展前途。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历经探索、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演进,形成了内涵丰富、系统严整、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积累了制度建设的基本经验,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第一,坚持把核心与中心的良性互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基本遵循。百年党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互动发展的关系,党的事业前进发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根本利益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最终确立和顺利实现。换言之,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核心,人民群众是服务中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在各项事业建设中贡献价值、发挥作用,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根基、力量之源泉。

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双重动力和根本保证。毛泽东曾强调:“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11](P78)}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系统中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中枢地位,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初步开启到基本确立、从曲折发展到拨乱反正、从改革创新到发展完善，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处于制度构建的核心地位、扮演着主导全局的引领作用，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内在需要，也是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运行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科学高效治理社会的主体基础和力量源泉是人民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P411)}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基本原则。制度建设不仅是为国家治理作支撑，为党的政权巩固作服务，更是为人民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实现作保障。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引领人民群众携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进程中，自觉地把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与服务人民中心宗旨有机统一起来，顺利实现了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坚持在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要义。科学的理论能够有效指导具体实践，而对具体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推动科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的先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既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实践经验、形成新的制度、推进理论创新，又通过创新理论来指导和推动制度创新、不断发展完善制度、规范实践行为，从而通过制度的中介环节来实现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和内在规定；又立足中国国情，植根中国大地，彰显中国特色，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具体历史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一方面，坚持理论指导实践。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科学体系，自始至终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体现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亦如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7](P109)}另一方面，始终遵循在实践基础上检验、发展和创新理论。基于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立足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党以及政治的学说和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民族个性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始终以历史条件为依据，没有教条式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提出的个别论断和具体结论。

第三，在守本传承与借鉴创新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有机统一起来

来,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和内在属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政治文化传统;又兼收并蓄,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合理成果,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人类文明由于各国民族性而丰富多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封闭僵化的制度体系,其建设需要在坚守本来的基础上,自主借鉴吸收人类制度文明成果。首先,坚守本来。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红色政治文化,坚定承续中华民族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不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事关国家根基、民族兴旺、人民福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基本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都必须始终如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决不能偏离或背弃。其次,借鉴外来。放眼世界,借鉴吸收世界各国创立的人类制度文明成果,吸收人类制度文明建设的历史教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最后,面向未来。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前现代、现代性、后现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方面还需要在改革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

第四,在民主与集中的张力系统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理论认为,民主和集中是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具有辩证统一关系。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推动了中国国家机关的权力建构,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遵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定、实施、监督、反馈,既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同时也反映出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绝对不是离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没有民主就谈不上正确的集中,就会导致官僚主义。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由人民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群众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既需要对人民群众负责,同样也要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这样就可以有效防止局限于个人或者少数利益集团利益而出现的个人独裁、寡头专断的弊端。民主集中制也不是离开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没有集中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可言,亦会步入无政府主义。例如,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体系中内含的全面领导制度和集中统一领导制度,能够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从总体上统筹协调各方利益与行动、增强整体合力,保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从根本上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分立、效率低下的弊病。可见,在君主制与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制度有着本质区别,“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13](P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体系赋有人民的本质内容和内在规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

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彰显中国制度建设经验的有效性

新冠肺炎疫情，既是我国公共卫生系统面临的重大危机和现实困境，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的实践检验。综合对比世界各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举措及其成效，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自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综合研判，统一部署、全面动员，打响抗击新冠疫情人民战、阻击战、攻坚战，取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重大战略成果，突出体现了中国经验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14]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的核心地位，彰显行动集中统一的显著优势。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胜利基石，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是“定海神针”。疫情防控过程中，每一套防控方案、每一次防控决策、每一步防控举措无不彰显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坚强领导、科学指挥，充分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和统一行动的核心作用，实现了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高效合理配置。

疫情发生后，党和政府及时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制定疫情防控战略策略，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体要求，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总体原则以及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为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防控就是责任，党中央及时果断派出中央指导组进驻武汉和湖北指挥防疫，迅速调派医护人员、开建诊治医院、调集医疗物质，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考察党员干部，坚持选拔退出机制，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同时，坚持党的全面领导。遵循全国一盘棋，着力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力量，为抗击疫情做坚实保障。政治方面，党中央要求“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15]勇于冲锋、敢于拼搏，让党旗在防疫一线飘扬，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政治保证。经济方面，扩大、增加防疫物质的产能、产量，确保居民生活主副食品供应，加强医用物资和生活必需品应急保供。文化方面，着力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积极帮助人民群众消除恐惧、焦虑心理，进而坚定信心、稳定情绪。社会方面，全力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民生发展工作，科学预防、妥善处置阻击疫情期间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矛盾及问题，防止矛盾激化和问题扩大，严厉打击涉疫违法犯罪，切实维护社会稳定。这些重大举措，充分彰显中国抗击疫情的高度、力度、速度、宽度和强度，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优势的集中体现。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彰显人民主体的显著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即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以及牢牢植根

人民,是党的理想信念的价值追求、性质宗旨的根本体现、初心使命的集中彰显,也是中国经验和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

坚持人民至上,原则是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生命高于一切。疫情发生后,习近平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确立了疫情防控的第一要务。“疫情就是命令,这个命令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个责任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责任。”^[16]同时,确立部分省份对口支援,组织科室齐全、人数庞大的医疗团队驰援,迅速开建火神山、雷神山收治医院,扩建方舱医院,保障武汉和湖北急需医用物质的优先供给,举全国之力支援前线,千方百计救治患者、拯救生命。坚持人民至上,关键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阻击战。习近平多次强调新冠疫情防控是人民的战争,必须自始至终“广泛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凝聚群众,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15]紧紧依靠和团结人民群众来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新冠疫情防控实践充分证明,只要党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为民所想、为民所择、为民所策、为民所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群众就会同党和国家一道勠力前行、共同抗战,携手战胜这场没有硝烟的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

第三,坚持集体主义价值导向,彰显上下贯通、各方协同的显著优势。抗击疫情的总体性、艰巨性、长期性及复杂性,决定了疫情防控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各方、联动上下、层层布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坐镇指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协调调度,这既能促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有效串通,保证时刻联动,又能协调各省市县区乡镇村的防控资源,推进具体的分类指导,从而确保各项防控措施、各方防控资源合理发挥功效。

从纵向层面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在把武汉和湖北作为全国疫情防控主战场,实施全面严格管控、统一指挥的基础上,立足各地区特点和疫情形势精准施策,对其他省份加强分类指导,统筹抓好其他地区防控工作,确立了全面部署、全面动员、全面加强强的疫情防控战略格局,保证了疫情防控上下及时有效的衔接、对接。从横向层面看,各省市定点医院及基层社区发挥了关键作用。定点医院作为防疫阻击战的前沿阵地,承担着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筛查、隔离工作。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明确要求在扩大检测范围、提升检测速率的前提下,竭力增加定点医院和方舱隔离区,保证收治床位,提高收治效率。基层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防线,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防线。把社区这道防线守住,就能有效切断疫情扩散蔓延的渠道”。^[17]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地“充分发挥社区在疫情防控中的阻击作用,把防控力量向社区下沉,加强社区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使所有社区成为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17]以网格化的形式构筑起抗击新冠疫情的人民防线。

第四,坚持依法科学防控的举措,彰显有序精准救治的显著优势。依法科学

防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疫情防控上的反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扰乱了国家和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而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局限，致使部分地方和相关部门的防控措施朝令夕改，加上疫情期间出现的严重妨碍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不满。为此，必须同时推进法治防控和科学防控，着力在法治轨道和科学道路上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提高公共卫生治理水平。

依法防控，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非常时期的特殊要求，其目的在于有法可依、依法实施，保证疫情防控有序、持续。这就要求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着力在法治治理的各个环节发力，依法维护社会秩序、市场秩序、防疫秩序的安定有序，切实推进依法防控。主要体现为加强法治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疫情防控法治意识；强化法律服务，为陷入矛盾纠纷的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援助；加强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造谣传谣和抗拒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等。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这是人类抗击病毒历程最宝贵的经验总结。习近平强调：“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18]疫情发生后，全国各级科研院所、企业和高校立即响应党的号召，迅速组建涵盖多学科、多领域科研团队，建立临床、科研、防控协同合作机制，在病毒来源和致病机理、快速检测技术和产品、临床救治和药物筛选、疫苗和抗体研发以及动物模型构建等方面夜以继日、争分夺秒联合攻关，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积极进展，并及时总结推广有效的临床经验和诊疗方案，有力地支撑了疫情防控工作，坚定了战胜疫情的自信心，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保证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6]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7]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8]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 [9]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1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 [14]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强调：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

善治理体系 善于运用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冲击[N].人民日报,2020-04-28(1).

[15]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N].人民日报,2020-01-28(1).

[16] 颜晓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

[17] 习近平在北京市调研指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强调:以更坚定的信心更顽强的意志更果断的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N].人民日报,2020-02-11(1).

[18] 习近平在北京考察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强调:协同推进新冠肺炎防控科研攻关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支撑[N].人民日报,2020-03-03(1).

On the Basic Experiences of Build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uan Yinchuan Bai Yunhua

Abstract: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as created and form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It adheres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and draws on the achievements of huma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ystem of the system has demonstrated it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Today, the world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hange an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o summarize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at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 i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of advantages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nat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y.

Key words: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evolution, basic experiences, significant advantages

[责任编辑:郑端]